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郁达夫的海外“文”踪

刘俊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卓著的作家，他出版于1921年的小说集《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在这本集子中的三篇小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发表后即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冲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从郭沫若的这段话中，不难感受到郁达夫小说一经问世就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受日本文学界重视

郁达夫作品所产生的冲击力，很快就波及到了国外，根据伊藤虎丸等人编纂的《郁达夫资料》，1923年日本的《雅声》杂志即刊登了对郁达夫的评述，山上正义、佐藤春夫等人随后都在文章中谈到过郁达夫。1928年，郁达夫作品开始有了日文译本。根据日本学者大久保洋子的研究：首次翻译《过去》是在原作发表（1927年2月）的1年后，《沉沦》是在原作出版（1921年10月）的19年后。在1945年以前，《过去》被翻译6次，《沉沦》被翻译1次；1945年以后，《沉沦》被翻译2次，《过去》被翻译5次。在反复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集的过程中，《过去》译文的整体收录次数最多，《春风沉醉的晚上》次之，其他作品的收录较为零散。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与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等人有过交往，因此他在日本文学界受到重视顺理成章。除翻译郁达夫的文学作品，如小田岳夫翻译了《过去——外六篇》、冈崎俊夫翻译了《我的梦、我的青春》，日本对郁达夫的研究也起步甚早。李丽君的研究表明，在日本最早将郁达夫作为对象进行学术研究的，是竹内好发表于1937年1月《中国文学月报》第22号的《郁达夫研究》，而竹内好的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论文即为《郁达夫研究》。与二战后郁达夫作品翻译的兴趣同步，日本郁达夫研究在此时也有了全新的突破，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等人编纂的《郁达夫资料》《郁达夫资料补编》堪称重要成果，而伊藤虎丸的郁达夫研究，则将日本的郁达夫研究推向了新高度。他认为，“郁达夫虽然接受了英国世纪末作家和佐藤春夫等日本作家的影响，但是与后者在颓废的后面有欣赏颓废的审美心理相比，支撑郁达夫的颓废是传统的‘感伤悲哀’的审美观念”。伊藤虎丸看出郁达夫受“外来影响”的外表之下仍保有“中国传

统”的内在底蕴，这不能不说是知音之论。除了伊藤虎丸的“传统论”，桑岛道夫的“理论论”和比较视野、坂井洋史和井上薰的“性”话语，以及小田岳夫的《郁达夫传——他的诗和爱及日本》、稻叶昭二的《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平井博的《郁达夫——他在文学上的探索》、铃木正夫的《郁达夫：悲剧的时代作家》和《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大东和重的《郁达夫与大正文学——从“自我表现”到“自我实现”》等，都是日本郁达夫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郁达夫有日本留学经历，又和日本文坛有交往，后来失踪也与日本人有关，这使得日本的郁达夫研究，主要聚焦“郁达夫与日本”，同时致力于解开他的失踪之谜。

与“南洋”文坛互动

在郁达夫生活过的另一个域外“南洋”，郁达夫作品的出版和研究也相当活跃，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不但出版了《郁达夫南游记》《郁达夫抗战论文集》《郁达夫集外集》《郁达夫选集》，还出版了《郁达夫别传》（温梓川著）。温梓川在中国留学时就和郁达夫有交往，因此他为郁达夫所做的传记视角独特，不但写得详尽生动富有代入感，而且对郁达夫颇为崇敬，提供了不少郁达夫“南洋”生活的细节，对于郁达夫最后的失踪，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除了马来西亚的温梓川，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作家原旬以及作家兼学者王润华（出生在马来西亚）等人也对郁达夫在“南洋”的人生经历和文学贡献，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南洋”郁达夫与马华文坛的纠葛和他最后的失踪之谜，作为各自的论述重点，体现出郁达夫在“南洋”的“文”踪重点。方修对郁达夫的肯定，着重在他“南洋”时期的抗日政论，认为这些政论显示了“郁氏晚年的思想似乎有着一番飞跃的进步”；原旬则特别梳理和分析了郁达夫与“南洋”文艺界围绕他《几个问题》一文展开的一场大论战。相对而言，王润华对郁达夫的“南洋”论述，从《郁达夫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到《中日人士所见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流亡生活》，几乎可以看作是郁达夫“南洋”人生的简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郁达夫在“南洋”还被黄锦树、林幸谦等新一代马华作家作为书写对象或人物形象，写进了他们的小说《黄锦树（M的失踪）》《死在南方》和诗歌《林幸谦（五四诗刻·郁达夫图）》——郁达夫由此被编织进当代马华文学中，“内化”或融化成了马华文学的一部分。

被英语世界探讨

郁达夫在英语世界的“文”踪，主要分布在一些文学选本中，如《沉沦》（Sinking）被夏志清编入《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相对于郁达夫的作品翻译，英语世界对郁达夫的研究似乎更加投入，成果也更为突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耶鲁大学出版社）是较早论及郁达夫的研究著作，作者一方面肯定郁达夫“唯有他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另一方面也觉得“他自己的想象完全来自真实生活，被其自我狭小世界里的感觉、情欲所支配”，因此有其局限性，是“带着病态的心灵探索者”。捷克学者普实克在他的《抒情诗与史诗》（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中也讨论了郁达夫的创作特色，认为郁达夫“最典型的特色无疑是其不稳定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在感情的整个阶上来回奔跑，从最低贱可悲的感情，直到最高尚最尊贵的感情如美的感受、自我牺牲等等”，郁达夫都表现得突出。他们对郁达夫的判断无疑深刻而准确。李欧梵在论及郁达夫时，则更多地从“孤寂”“漂泊”的人生形态和“自我幻象”的追求等方面，开掘出郁达夫“以写作和暴露他内心魔鬼给他想象中的读者来被除和驱去这些内心魔鬼，自白就是他的治疗法”，因此“他必须是颓废的”，因为唯有这样他才能实现“自我幻象”。这就将郁达夫研究推向了心理分析层面。在此基础上，加州大学的史书美将郁达夫视为“以实践颓废美学来揭穿传统道德和美的真面目”。

英语世界中，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R.O.Chang的博士论文《一个与世疏离的天才——郁达夫》，将郁达夫归结为文学天才，认为“他的小说表现了一种吸引力——一种和人类心灵深处最动人的情感联结在一起的吸引力”，这个评价无疑是相当高的。比较起来，夏威夷大学的Michael Egan对郁达夫的评价则具体实在得多，“具体”是指他主要研究郁达夫的早期作品，“实在”指的是他认为，将色彩、时间、心理元素、反讽运用代入作品，是判断郁达夫成为“现代”作家的重要标志。

欧洲学者中，除了普实克，斯洛伐克学者多勒扎洛娃称用英语研究郁达夫的重要人物，她不但用斯洛伐克文翻译过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起死回生》（《春风沉醉的晚上》），而且还用英文写过两本专著：《郁达夫文学创作之特征》和《郁达夫与创造社》。



▲小田岳夫译《过去——外六篇》



▲冈崎俊夫译《我的梦、我的青春》



▲小田岳夫著《郁达夫传——他的诗和爱及日本》

对于郁达夫文学创作的特点，多勒扎洛娃从“自我表现”的多样性、创作方法的丰富性、文学观念的变化性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郁达夫创作的主要特征，虽然论点较为平实，但贵在论述全面。比较起来，荷兰学者黎德机对郁达夫与佐藤春夫比较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则显得更有深度。黎德机认为，郁达夫的小说世界，自责心和挫折感同在，疏离意识和性苦闷共存，既吸收中国传统文学技巧又糅杂西方文学因素，反映出当时中国文化世界的混沌(chaos)状态。

郁达夫的海外“文”踪，驻足日本、“南洋”，远及北美、欧洲。总体上看，郁达夫在日本是一个“关心”的对象，在“南洋”是一个“好奇”的对象，在北美欧洲则是一个“研究”的对象。日本通过郁达夫看到了自己的文学影响力和历史罪孽，“南洋”通过郁达夫看到了自己的文学成长和影响痕迹，北美欧洲则通过郁达夫看到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切的合成，则构成了郁达夫海外影响的完整“文”踪。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配图由郁达夫之孙郁峻峰提供）

凉州不凉，文脉绵延。尽管凉州词抒写的不一定是凉州，凉州却演变为一种历史文化符号而存在。汉唐时，因就职或不同缘由到凉州的王维、高适、岑参等诗人，无不在凉州留下了深深烙印。一曲曲凉州词，让人们在回望凉州时，仿佛置身于历史的脉动中，随羌笛的节拍和金戈铁马的声响，倾听有别于莺歌燕舞、小桥流水的慷慨高歌。

繁华之上，创作的难度便增加。再辉煌的历史，一走入活生生的现实，便是挑战。

宏大叙事不是历史的全部。小切口，往往会使历史的瞬间或细节更能直指人心。

凉州籍或居于凉州的当代写作者，面对辉煌的历史，难免会陷入迷茫或沉思。让凉州在纸上焕发新生，拥有勃勃生机，而不是单纯地把历史摊开，插上几根旗杆，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课题。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这片西北的热土，会发现“文学凉州”今时已不同往日。

叶舟之于凉州，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一部《敦煌本纪》，不仅为敦煌立传，更为找寻那些失落已久的民族血脉和气质。三大家族跨越半世纪的命运沉浮，说尽河西走廊的来路与归途。与生俱来的野性，在河西走廊奔逐，“冰天跃马”的梦想插上翅膀，一挥袖，凉州便气象万千。

祖籍山东的王登渤出生于凉州，把凉州视为故乡。一部《凉州的光响》，吟唱、弹奏、曼舞，给丝绸之路平添了浪漫情调，让行走的旅人不再孤单寂寞。在他笔下，五凉文化东渐，凉州学者、儒生乃至僧侣参与了一场浩大恢宏的历史壮剧，在拓跋鲜卑之后，中国文化中浸润了一股来自旷野的浩荡之气。也正是依凭这股气息，迎来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气度的大唐。

古马提着牲刀，把丰满的凉州铸得形销骨立。在《胭脂牛角》《西风古马》《红灯照凉州》《落日谣》等诗集中，他插入凉州的缝隙，离凉州越远，心却靠得越近。他骑着西风瘦马，专找那些精悍的意象和短章，像乌鸦穿了鞋子，在西夏的苍茫中奔走。

徐兆寿一路向西，在五凉的漩涡中奋力摇摆，试图靠近河流的另一岸。一部《西行悟道》，堪比文学上的西域凿空。如李敬泽所说，这样的书写是在新近获得的历史自觉、历史洞见的视野里，重新认识、重新讲述的西部，凸显出“凉州是中国人恒久的精神边疆”。

雪漠的大漠三部曲被称为“守根的文字”。这位土生土长的

◎解码文学空间

心事浩茫话凉州

李学辉

凉州作家，为日益消逝的西部农耕文明做精神传记。他的长篇小说《凉州词》，展示的是“武侠世界背后的世界。”他剑走偏锋，找寻凉州武魂与人之生存的相融点，看似“草灰蛇线，伏脉千里”的奇幻，叙写的其实是“一种无比真实的生活”。

他们的努力，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凉州。他们的笔下，凉州不单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一种充满奇异的意象。他们突破了宏大叙事和华美风格的单向输出，竭力在找寻一种根脉的所在或延伸。凉州，在他们笔下生动起来。这是凉州的宿命，也是他们的使命。

各种文化的杂糅，须得顺丝而抽，理出那条主线，连缀起凉州的古今。

这座城市，太古老了。古老得令人肃然起敬。在认真读过《伦敦传》《东京传》《北京传》《南京传》和《丝绸之路》后，我发现凉州在豪放之外，更是内敛的。它站在了历史的背面，拉长的背影上，有行字在跳跃，那就是新凉州的前世今生。

这座工商业并不发达的城市，在当今，如何重拾汉唐的辉煌，重新发挥丝绸之路桥头堡的作用，像阿来那样远眺，像马步升那样测度“雄鹰罗什的法种与舌头”，留给我们无限空间。

文脉深处，总会芳华四溢。（作者系甘肃省作协副主席）



与唐代诗人实现生命对接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诗佛王维为何从儒学转向佛学，在人世出世之间，他如何应对内心的困厄？从一介布衣到朝堂重臣，韩愈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发出自己的声音？白居易的人生是否如他所说的“知足保和”那样淡然超群？近日，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的随笔集《唐代五诗人》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该书凝结了张炜20多年来研习古诗的结晶，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甫和李商隐5位唐代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的角度，深入他们的精神与艺术世界，让每一位诗人在文本中复活。

在张炜看来，人性决定诗性。诗人的道德感、价值观、身份和立场，构成了他们的创作基础。如论及韩愈时，张炜指出，“韩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辩，使他在对待一切事物，无论是情与景、人与事，都一概全力以赴，兴致勃勃。他在阐释事物的过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种决战的姿态。”“为了完成这种超常的表达，他必须要寻找抵达极境的一些词语，于是也就有了新奇的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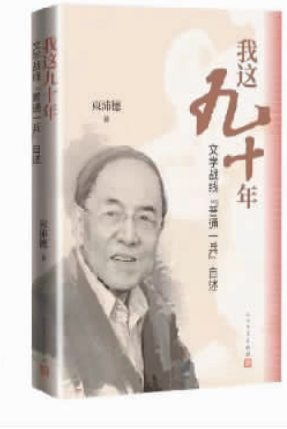


◎新作评介

秋光依旧似春光

《我这九十年》读后感

肖复兴



收到束沛德先生题赠的《我这九十年——文学战线“普通一兵”自述》，一口气读完。这里有我熟悉的《我当秘书的遭遇》《我也当过炮手》《难忘菌子》等篇章，也收录了我未曾读过的不少新作。全书分为“我与作家协会”“我与儿童文学”“我的良师益友”“我的笔耕生涯”“我的亲情家风”“我的夕阳时光”6辑，以“我”为主角，雪泥鸿爪，串联起作者与文学结缘的人生轨迹。读后，有一种翻阅厚重老相册的感觉，落花流水，蔚为大观，须眉毕现，栩栩如生。这本书无疑是束沛德先生九十大寿最好的礼物。

在儿童文学领域，束沛德集领导者、组织者、观察者、评论者和建设者于一身，说他如同儿童文学园地的一棵大树，浓荫之下，庇护并培养了几代儿童作家，大概他不会同意，因为他从来是谦逊的、平易的。书中他不只一次称自己是跑龙套的、打杂的，是散兵游勇，这是他对一生钟爱的儿童文学最朴素真挚的感情。在编辑《束沛德谈儿童文学》一书时，他坚持用“谈”字，而不用“论”字。他说，书名用“谈儿童文学”而不用“论儿童文学”，是“量体裁衣，更切合实际”。这很能说明束沛德对于自己所处的角色和所做工作的基本认知、态度和感情，他把身段拉得很低，不愿做振臂一呼高悬于上的姿态，与这本书铅华洗尽的风格很是吻合。

不过，在涉及儿童文学观时，他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为谁创作？他说儿童文学是为我国“几亿儿童创作的”。创作标准？他说“以情感人，以美育入”，这是“儿童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功能”。对作家的要求？他说“儿童文学作家要永葆童心。失去童心，失

去童年生活对自己的馈赠，就可能捕捉不到生活中的美和诗意，捕捉不到孩子们独特的情感、心理、想象。”这三方面构成了他几十年来稳定的儿童文学观，对于今天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儿童文学现状，尤其具有明心醒目的作用。

书中还可看到他对他师友们及普通作者的感情。写德高望重的前辈或功成名就的晚辈，很容易锦上添花、肥肉添膘，或沦为人情站台式的敷衍和吹嘘。但束沛德能将这类文章写得出自真情，平实而感人。特别是《一本诗集联结了我们》里，写与一位几十年从未谋面的业余作者的感情。1956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请束沛德为志愿军战士蔡庆生的诗集《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做初审和编选工作。诗集出版后，他保留至今，并在耄耋之年终于和蔡庆生联系上。60余年漫长岁月，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经历多少迁徙颠簸，又不是自己的熟人或亲人，束沛德却能将一本薄薄的诗集珍存至今，足见其重情重义、心思细腻。这样的小细节，已经蔓延于文学之外，尤为令人感佩和敬重。

“我的亲情家风”“我的夕阳时光”两辑，使我更加了解束沛德人生的侧面。读《相见时难别亦难》，品味出他与亲人的缱绻之情；读《童年记事》，谁能想到这样一位温和的谦谦长者，当年竟站在八仙桌的椅子上，学京剧武生，一下子从上面跳下去？也许，拥有这样的童年经历，命运才会让他与儿童文学结下一辈子的不解之缘吧。还有一篇《退休23年来辞旧迎新日记》，最为别致，收录了1998年到2020年20余年来每年最后一天的年终小结，生活写作、家人朋

友、居家旅行、患病医疗等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删繁就简，清晰而情趣盎然地留下他的履痕与心迹。这样穿珠成串、蒙太奇式的拼接闪回，起码我是没见过。2004年12月31日，他写到：“晚上做了千贝三丝、清蒸桂花鱼等菜肴，一家人举杯共祝新年好。”2012年12月31日，他写到：“我和崑身体、精神还算好，生活能自理；我俩乘公交车先后探望了几位病中的老同事、朋友。”2014年12月31日，他写到：“读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已读了三章，60多页。”这三组特写镜头记下的并不是什么大事，但不要忘了，作者已是耄耋老人。我们看到了他对生活一如既往的热情，对友人一如既往的情谊，对年轻作家一如既往的关注。这是三幅活色生香、温馨蕴藉的画面。

诗人布罗茨基说：“一个诗人的影响，就是一种放射和辐射，它会传递一代人和两代人。”束沛德就是这样的，他用他的文字，他的工作，更用他的心地、感情和精神，影响着我们，并将传递给下一代和两代人。因为这样的影响，也是他从上一代那里继承的，如书中的赵景深、严文井、沙丁、远千里、菌子……

合上新书，意犹未尽，写下一首打油，作为此书读后感，并祝束沛德先生健康长寿——
儿童文学一生忙，
九十风霜染夕阳。
鸿爪雪泥留岁月，
蜗头鹤发混文章。
深枝著子多新熟，
幽谷开花晚后香。
龙套情缘不辍老，
秋光依旧似春光。